

關於皮高品的基礎知識中幾個問題

圖書館學系三年級學朮思想批判小組

皮高品說得對：“編制圖書分類法不是一般性的業務工作，而是一種具有學朮性的工作，……”。這就是說，編制分類法需要比較廣泛的知識，對各門科學要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否則你編制圖書分類法時，不可能按照科學分類的體系來安排類目，皮高品是分類法的“專家”，他在講分類課時，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講科學的體系，可惜他都沒有講清楚，有不少是講錯了，現就其中幾個問題提出來談談：

關於哲學，皮高品在“編制圖書分類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見“圖書館學通訊”1957年二月號）一文中說：“辯證唯物論同其他科學一樣有它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條件的”。但接著他說，“它主要的是批判改造黑格爾唯心辯證法和費爾巴哈唯物論以及批判的繼承過去全部理論遺產而成”。（着重點是引者加的）他這種提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我們承認，辯證唯物主義和過去舊哲學有一定的繼承關係，但不能說它“主要是”批判和改造舊哲學“而成”。辯證唯物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想和理論，它的產生，是“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皮高品看來一種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他產生的歷史條件是不重要的、是次要的，這顯然是錯誤的。辯證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哲學，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理論武器，它產生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在和工人革命運動的實踐密切聯繫中，在和剝削階級的思想體系的無情鬥爭過程中產生和發展的，它的產生是哲學中的革命變革。可是，照皮高品的說法，似乎辯證唯物主義的產生，只是個別人物純粹學朮上的研究，對前人繼承的結果。這樣一來，就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活生生的革命內容剝掉了。

皮高品給哲學下的定義也是很荒謬的。他在解放後編的“圖書分類法”講稿中說：“哲學史就是一個追求與認識客觀真理的過程，從形而上學的方法發展到辯證的方法的過程”。這裡他給哲學史下了二個結論，從這二個結論看來，把哲學史研究的對象看成和一般科學史研究的對象一樣了。同時哲學史既然是形而上學發展到辯證法的过程，因此似乎在形而上學作為研究事物的方法出現以前，就不會有過辯證法，人類認識中一開始出現的就是形而上學，顯然這是不符合哲學史的事實的。我們知道，哲學史是研究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胚胎，發生和發展的歷史，而唯物主義總是在與唯心主義鬥爭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

講圖書分類法的時候，本來用不着多講哲學，但皮高品在給各門科學下定義時，用很長的篇幅來講哲學，在他大講哲學時卻講了一大堆“論”，就是沒有“唯物論”。好象哲學就是“唯心論”、“觀念論”、“超越論”、“經驗論”、“新實在論”、“理性論”等等，而且講這些“論”時又無批判，即使有一點，也是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甚至是錯誤的。例如他說：“唯心論的謬誤太明顯了。‘我’是存在，存在就是物質，這個淺顯的道理他們（指唯心主義者）是知道的。唯心論的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存’，就是一個明證。……‘我’既存在，我就是物質了。但唯心論者偏要在超越經驗範圍以外虛無的地方去找物質背後的东西”。這樣就把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存”說成是唯物主義的公式了。其實笛卡爾的“我思故

我存”的公式是唯心主义的，他从自我出发，得出了整个世界存在的結論，但由于他主張怀疑，因此这个从自我出发得出的整个世界存在的結論，也不能完全肯定。这怎么能把“我思故我存”的公式了解成是唯物主义的？

关于经济科学，皮高品說：“经济是基础。新经济关系的出现，必然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他对我国现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关系，随着这一新的经济关系的出现，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政治经济学这点，避而不谈。不过从他对经济科学的上述解释中应该得出如下的結論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新的经济关系的出现，应该制定某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我国已经接近于彻底消亡，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的成长和发展，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消亡，那么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部分发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 and 分配的规律，它研究人类社会怎样由没有阶级的社会过渡到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又怎样由有阶级社会上升到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它研究人类社会几个基本生产关系的类型，即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限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要它，而要去制定某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皮高品对经济科学的論点如果不是由于不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有他的看法。

关于文化教育，皮高品下的定义也是有问题的。虽然他承认“教育是具有阶级性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他又說：教育“它是不依赖它所生存的具体历史条件而独立的”。这样也就在实质上推翻了他前面自己的論断，否定了教育的阶级性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而教育也不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了。

皮高品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知道，教育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各个阶级都要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制定一套适合本阶级利益的教育制度，（当然被统治阶级一般說来是没有这种条件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它就有一套把人培养成为对统治阶级有用的，能满足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得无厌的慾望的工具，它需要被剥削阶级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一定的文化；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了许多与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完全不同的各种形式的学校和其它教育制度，所以教育是历史的、阶级的范畴，决不是象皮高品所說的那样，什么“教育是不依赖它所生存的具体历史条件而独立的”。这种說法不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我们知道旧社会的教育的最大“禍害”之一就是書本教育与实践脱离，（列宁）我們党的教育方針和旧社会的教育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党的教育方針必須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照皮高品的說法，教育不必为无产阶级服务。可是教育既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如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然要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情况下，認為“教育是不依赖它所生存的具体历史条件而独立的”說法，就不能不是反动的，不能不是企图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主張教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

皮高品給文学艺术所下的定义是莫名其妙的，他說：“文学和艺术是具有特殊形式的东

西。沒有這種形式就不能叫做文藝，它們之所以和非文藝的東西有所區別就在於它們有這樣特種的形式。也就是說，文藝的書籍是靠形式來表現內容、傳達思想的”。他這樣說來說去只說出了文藝就是一種特殊形式，至於這個特殊形式是什麼東西，卻只字不提，好像有了這個攔里攔統的特殊形式，就都是文藝了。

我們承認，文藝確是有它獨特的形式，這個特殊形式就在於文學是以語言為主要工具，是通過形象和典型的概括，反映出生活的真實和社會的本質。而藝術是以藝術的、感覺得到的形象，來反映現實、复制現實，它們和其它思想一樣，是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在階級社會里，它們是階級鬥爭的思想武器，因此掌握和認識文學藝術要從它們的形象性、典型性、文學語言藝術等來理解的，如果單從形式來說明文學和藝術的特徵，將導致人們忽視它的政治思想內容。皮高品對文學藝術所下的定義，如果不是形式主義，那就是他不懂文學藝術。

皮高品對自然科學的理解，是唯心主義的。他說：“因為有了自然科學的發達，才有醫、農、工各種技術科學的發達。沒有科學上的進步，技術上的進步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很清楚的表明了皮高品在科學和實踐的關係上的唯心主義，是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和實踐的關係的了解根本不合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是在人們的生產實踐活動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在科學發展上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一些問題和概念的邏輯發展，而首先是技術發展的需要，物質生產發展的需要”。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如果說技術“在最大的程度上依賴於科學的狀況，那麼科學在最巨大的程度上依賴於技術的狀況和需要”。正因為技術上的需要才發展了科學。例如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流體靜力學，就是為了防治意大利山洪而創立的。由此可見：科學是由實踐中總結起來的，而醫、農、工各種科學都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和進步的，技術科學的進步正日益豐富了科學的領域，推動了科學的進展。反過來，科學也推動了技術的發達。這和皮高品的只有“自然科學”（理論的）的發展，然後才有“醫、農、工各種技術科學”（實踐的）的發展是根本不同的。

皮高品在圖書史講義里也出了不少問題，這裡且不說他厚古薄今如何嚴重，只就他的歷史觀點提出幾個問題來談。皮高品在分析清朝發展到了乾隆時由盛而開始衰退的原因時說：“每一個封建王朝在他建立的初期，為了恢復生產力，一般農民是要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的（着重點是引者所加），因而得到一個承平的時期”。這大概就是皮高品所理解的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規律吧。但是我們知道，在封建社會里，地主階級對於農民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起來反抗，對地主階級展開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每當舊的王朝被推翻，新的王朝剛上台的時候，由於農民起義的事實教育了他們，這就使他們暫時地不得不對農民作一定程度的讓步，而這種讓步也是統治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收買人心，以便鞏固其統治地位所採取的一種手段，並不是封建王朝對農民的“保護”。如果說到保護的話，它們只會保護他們對農民的統治地位，“保護”農民做奴隸當牛馬的地位。如果按照皮高品的說法，好像那些封建統治階級倒真有“恩”於農民了。這種說法和封建衛道者的口吻是一脈相承的。

同樣在講到春秋時代是我國圖書史上一個轉變時代的時候，皮高品更有其獨特的見解，他說“階級的鬥爭越來越尖銳。鬥爭的結果，封建剝削階級的統治一層層的垮。……少數的卿大夫爬上統治階層，極力地爭取被剝削的眾人，尤其是士這一階層”。這樣他就主觀地把

“士”作为被剥削的众人，这是很荒谬的。“士”是什么人呢？“士”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寄生阶级，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和走狗，它的产生形成是由于世卿制度的崩溃，由贵族没落分子转化的，由于他们保有统治人民以及贵族间彼此倾轧的经验 and 知识，所以国君和贵族，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财富，就收罗他们作为自己的工具。（参见尚越：“中国历史纲要”），由此可见，他们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的帮兇，丝毫找不出什么根据来证明他们是属于被剥削的众人。皮高品把他们说成被剥削的众人，不是很明显的颠倒事实吗？

皮高品用完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我国过去的科举制度：“图书在阶级社会里是阶级斗争的‘顶强有力的武器’……。最毒辣的是他们（封建地主阶级——引者）兴科举制度以经义取士，‘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而为他们服务。因而造成我国过去长期的贫困和落后，也就是我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尤其是近百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着重点引者所加）。皮高品避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孤立地把科举制度说成是我国贫困、落后，尤其是我们近百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断：“中国历史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就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8—619页）毛主席在同一文章的另一地方又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皮高品的解释不仅否定了在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残酷压迫和剥削的事实，而且也抹杀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这就模糊了阶级斗争的视线。

皮高品对太平天国革命产生的原因也解释得非常荒谬，皮高品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鸦片和基督教随着帝国主义的大炮象流水一般的涌进中国，……但是鸦片和宗教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就成了我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皮先生一笔抹杀了造成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广大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深刻矛盾，而把这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原因归结为鸦片和基督教！更加可笑的是，他说：“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出现的启示之下，空前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的爆发起来了”。（着重点是引者所加）1922年才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怎么会指导1919年的“五四运动”呢？皮高品还把有名的资治通鉴说成是我们“先代劳动人民”的著作，这样司马光也就成了“劳动人民”。

以上所谈的还不是皮高品讲稿中的全部问题，但已经可以看出皮高品的基础知识的一斑了。我们这篇东西，是很不全面的，但希望对皮高品能起举一反三的作用，引起皮高品对自己所讲的课，所写的文章来一次认真的自我检查。